



襄垣文史資料

第六輯

政协襄垣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政协襄垣县文史资料

第六辑

政协襄垣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41344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分管主席：韩克昌
主任：冯引子
副主任：刘焕珍
委员：王兴明
史启荣
李月明
屈毓华
范永峰

王晋峰
刘国青
苗 谨
郝庆华
韩宏喜

会 员

创 始

日八十二月二十年戌戊

1981.12.8

目 录

襄垣戏剧发展简史	(1)
襄垣曲艺的源流沿革与发展	(33)
襄垣秧歌剧种音乐概述	(48)
襄垣民间社火	(207)
一生不求名和利 誓于秧歌共兴衰 ——记戏剧家李琪鸣	(230)
久负盛名表演艺术家韩德山	(242)
太行第一旦张木和	(250)
上党第一代女演员李雪娥	(258)
农民剧作家李生秀	(264)
农民音乐家张天才	(268)
曲艺艺人李中堂	(272)
襄垣县戏剧专业表演团体历史大事记	(280)
襄垣县曲艺专业说唱团体历史大事记	(299)

襄垣戏剧发展简史

韩宏喜

襄垣戏剧,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剧目繁多,人才辈出,流布甚广,业绩辉煌。纵观她的形成和发展,在一代接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关怀下,在一批接一批艺术人才的共同努力下,随着岁月的推进,一本接一本地相继推出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深得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与此同时,在襄垣县的戏剧史上,一页接一页地谱写了篇篇光辉乐章。

襄垣戏剧的发展概况

一、襄垣秧歌剧种的形成和革新

襄垣秧歌,是襄垣劳动人民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共同创作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襄垣秧歌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她是山西上党盆地独有的“土特产品”,她是襄垣人民唯一的代表剧种。多少年来,她那幽

默、诙谐、粗犷、奔放、活泼、明快的表演形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襄垣秧歌源远流长,起于何时,尚无确切记载,但据一些老艺人的师承关系考证,经许多不同层次的文化人研究,她诞生于明末清初,发展于抗战时期,繁荣于五十年代。襄垣秧歌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一) 从干板“地圪圪”(1736—1795 年间)的简易演唱形式到有弦乐伴奏、有角色行当之分的半职业班时期;

(二) 从半职业班到职业班时期;

(三) 从旧职业班社到新型的秧歌剧团时期。

大约在三百年前,(明末清初)襄垣人民在劳动之余,喜欢说唱者,全凭即兴发挥,随口“哼”成了一种简单曲调,逢年过节,在街头演唱。因无任何乐器伴奏,故称之为“干板”秧歌。因演唱者随心所欲,就地表演,众人四周围观,又称之为“地圪圪”(即:打地摊)秧歌。这两个特点相结合,人们就十分自然地叫成了“干板地圪圪”秧歌。到了乾隆年间,开始使用一种自做的乐器(俗名:胡胡)伴奏。后来随着唱腔内容、故事情节的发展需要,又有了角色之分。角色分了行当后,“地圪圪”的简易演唱形式,开始走上了舞台,伴奏的乐器,在“胡胡”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二把”。同时,艺人们自发成立了“自乐班”、“同乐会”等半职业班

社。戏剧服装开始用上了简陋的生衣、旦衫、黑圪筒等。另外,舞台上还逐渐出现了象马鞭、笔、砚、木刀等简单导具。同时,演员上下场也有了一定规范。后来,随着戏曲表演的逐步多样化,艺人们在音乐伴奏上,勇于创新,大胆尝试,在充分发挥弦乐伴奏的前提下,开始配备了击乐效果。定角色,分行当的自然表现形式,不自觉地加快了戏曲表演程式化的步伐。从而,这种程式化表演形式,又有力地推动着襄垣戏剧向前发展。道光年间,各行当都相继唱出了名角。象西营旦范东喜、下良生李栓成、善福旦田维、店上丑韩苟旦等。咸丰年间(1851—1861),又唱出了上良旦赵满有、西营丑赵黑旦、源头生李改成、白杨岭三花武根戌等。各行当名角的相继出现,拉开了繁荣襄垣戏剧的序幕,打开了振兴襄垣戏剧的新局面。1877年(光绪三年),天遭大旱,有一个从河南沁阳逃难上来的铁匠徒工,名叫张金川,他酷爱襄垣秧歌,就在襄垣县上良村落了户,拜老艺人赵满有为师,整日学唱。由于此人富有艺术天资,嗓子又好,扮相也美,表演更有情,一时成为戏坛名流,人称“铁匠旦”。1880年(光绪六年),他到长治西火一带打铁,又学会唱西火秧歌。这样一来,襄垣和西火两种秧歌水乳交融,将襄垣秧歌的唱腔开始推向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首创了秧歌慢板唱腔,人称“一道腔”。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发展成“三滴水”。

襄垣秧歌从演出农家故事特别是那些“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剧目，到演出表现朝野盛衰的大本头，经历了一条相当曲折和布满坎坷的道路。大约在1884年（光绪十年），由上良艺人王福锁发起，集中了襄垣的西营、下良和武乡县的下合、北漳等十八个村“自乐班”的名艺人，组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秧歌职业班社——“十八村秧歌班”（人称大秧歌）。这个秧歌班社，从演员配备、音乐唱腔、服装导具以及上演剧目等诸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新班社的组合，促使了名流集聚，阵容壮大，队伍扩充，设备更新。上演的剧目又增加了《河灯会》、《富贵图》、《访山东》等反映宫廷朝野题材的大型剧目。随着人民群众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十八村秧歌班”上演的表现帝王将相的大型朝野剧目，因受唱腔限制，越来越出现了不相适应性。针对此难题，不少艺人探索新路子。最后，终于采用了“借鸡生蛋”的演出形式，也就是“襄垣秧歌与上党梆子”相结合，根据服务剧中人物的需要，“梆子”、“秧歌”交替演唱，如“官”唱梆子，“民”唱秧歌，花脸、武角唱梆子，文生、旦角唱秧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得到了观众的认可。随之，人们把这种形式称之为“风搅雪”。在唱腔上，“风搅雪”虽还不算真正的改革和发展，但就培养人才、拓宽戏路、健全班社等方面来说，确是襄垣戏剧史上一个全盛时期。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夕（1911—1937），秧歌职业班社先后发

展到五十个之多。其中较著名的有襄垣的“改良班”、“富乐意”、“天成班”、“悦意班”；屯留的“安乐班”、长子的“安乐意”、武乡的“鸣凤班”。职业班社相继增多的同时，又出现了象李雪娥、路根孩、小梅等第一代女演员。这些巾帼英雄“杀”上舞台后，不仅填了上党戏剧史上空白，而且成为当年的上党戏坛上前所未有的破天荒之事。襄垣秧歌这支艺术花朵，开放的虽小，却绚丽多姿，芳香四溢。在战争年代和建国时期，她充分发挥善演短小精悍、生动活泼、讽刺幽默的小型剧目之长，去努力反映群众翻身斗争过程中的真实故事，准确而及时地描写抗战胜利前后，军队和老百姓的生动事迹。密切配合革命斗争，迅速反映现实生活，是襄垣秧歌剧种独特的优势。凭着这种优势，当年，编演了数百个新剧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表现现代题材方面，大胆地运用了襄垣秧歌的多种艺术形式，借鉴古典戏曲中的有益部分，并将其再度加工提炼后，十分得体地揉到了新的剧目中。在舞台革新、艺术表演、角色塑造、音乐唱腔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在各行当唱腔板式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实践，突破了旧秧歌固有程式的束缚，进行大胆的尝试。在深入挖掘传统唱腔的基础上，吸收其它剧种的长处，进行改革，加以丰富、发展和提高，从而先后创造了秧歌的数板、散板、摇板、垛板、圪连板、花音垛

板等许多新的板式,还较成功地运用了伴唱和合唱的形式,创造性地革新成功了四分之三的节奏板式,使襄垣秧歌的唱腔产生了飞跃。在上演较大的历史剧目中,生旦净丑各行当均有了代表性的唱腔。从此告别了“风搅雪”,独当一面地完成了剧本所赋予的任务。

二、戏曲表演团体的组建和演变

襄垣秧歌戏曲表演团体,分别在各个历史时期,凭着艺人的爱好去组建;随着时代的推移去演变;根据斗争的需要去更名;依照国家的政策去整改。最早追溯到封建社会的光绪十年(1884年),由上良艺人王福锁发起,集中了西营、城底、南漳、上良、下良、白杨岭、韩庄、店上、源头、寨头、善福和武乡县的上合、下合、北漳、监漳、陌峪等十八村的自乐班、同乐会的名艺人组成了“十八村秧歌班”,这是襄垣历史上的第一个秧歌班社。该班社没有东家(即:班主),全由艺人集资入股,先后推选王福锁、李改成掌班。活动区域,主要在襄垣的北中部和武乡县的东部农村。此班社艺人的工资不固定,实行台口分红。戏班人不敷出。光绪十三年(1887),王福锁病故后,由打击乐手李兴旺(下良人)召集了该班的大部分艺人,自东自掌(即:东家兼掌班),成立了“民意班”。“十八村秧歌班”随之解散。

襄垣县的旧政府公款局,承事王维新(东北阳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赵录甫(北关人)、苗不然(大黄庄人),于民国十三年(1924),成立了“改良班”,又名“改良新剧社”“官秧歌”。该班社的活动区域遍及上党十九县。戏箱除接受南返头李茂华秧歌班的,又从苏州购进一批新服装。该班的拿手剧目是《风仙庄》、《兰家岗》、《装疯洞》等,很受群众喜爱。民国十六年(1927),襄垣县公款局感到经营戏班无利可图,即将此班转让给该班的演奏员李旺孩(夏店人)经营,改名“富乐意”。

“富乐意”于民国十六年(1927)成立。东家李旺孩(又名:李小旺),箱把(即:演出设备)为“改良班”的全部家底,掌班是曹双喜。该班的活动区域,除跑遍上党十九县外,还扩展到晋中的祁县、太谷,晋南的安泽、临汾一带。该班从成立到抗日战争前夕,成为襄垣旧秧歌班盛极一时的班社。曾与当时最负盛名的上党梆子戏班竞相抗衡。当时,流传在人们中间有这样一句顺口溜:“任超班,秃嘴戏,比不上襄垣秧歌富乐意”。(“任超班”是指当时潞城县的任超头班二班,“秃嘴戏”是指屯留、长子、长治的牛郎、秃嘴等四家三意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该班在长子县罗家沟演出后,国民党中央军孙殿英部,将戏箱名曰借实为抢,全部夺走。连同箱倌李长才(田漳人)一并劫去。该班随之解散,艺人流浪四方。

民国二十九年(1930),“悦意班”成立。东家是官道地主郭银庆,掌班是韩金林,演职人员大部分为“富乐意”班社名艺人的徒弟。这批人才可为当时襄垣秧歌的后起之秀。该班的上演剧目和活动区域与“富乐意”基本相同。1937年的一天,该班从沁水县演出归来时,闻听“富乐意”的戏箱被国民党中央军抢劫,即将戏箱垛到常隆镇,班社也随之解散。

1938年春节,襄垣四区牺牲救国同盟会,为了更好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激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提出并倡导组建一个秧歌戏曲剧团。此举得到了四区抗日政府的大力赞助。春节后不久,即由四区区长孟兆贵、牺盟会协理员王苏塘二同志负责,动员韩庄曹双喜献出了全套戏箱。以曹双喜秧歌班为基础,吸收了流散在农村的原“富乐意”、“悦意班”等秧歌班社的旧艺人三十多人,组建成晋东南地区第一个由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地方戏曲剧团。1938年阴历正月十六日,在杜村山上的大庙内,隆重举行了成立大会,正式定名为《襄垣四区抗日农村剧团》。由牺盟会协理员王苏塘(北关人)兼任团长,赵生祥(付北祁家沟人)任指导员,旧艺人名角(原“富乐意”掌班)曹双喜任副团长。该团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杜村、送返、大池、虢亭、九庄、南姚、史北、龙王堂等襄垣北中部。每地演出一般为三天。该团上演的剧目较旧戏班有不少改变。剧团在规章制度、生活管理及演出习

俗等方面做了不少改革。如改一天演三场为只演两场,这两场的演出时间一般是下午和晚上。演出前的坐场(又叫“出官”)改为向群众做抗日宣传讲话。全团演职人员,每天早上出操、跑步、打背包,上午学习。全团人员相互之间开始称呼“同志”。在此期间,下乡演出不讲戏价,改为募捐。演职员发生活费,吃大锅饭,不住戏房,分散在群众家里。

1938年秋,敌占白晋公路后,中共襄垣县工委为加强敌后抗日宣传工作,派牺盟会干部黎浚和抗日县政府教育科科长李茂斋,在县立第一、二、三高小和霖生高小的毕业生中,吸收了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组成一个以表演歌舞剧、话剧为主的新型剧团,定名“襄垣县抗战剧团”。1939年7月又改名为“襄垣县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队”。团(队)长先后为李茂斋(故县人)、李干卿(西港人)、王苏塘、史荣保(史北人),政治指导员黎浚(辽宁人,混血种),艺术指导员燕军(河北省人),剧务股长李振华(施家岭人),副股长石丽华(嵩岭人)。到了1939年底,随着敌我形势的变化,县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队的演职员,陆续分配做了其它抗日工作。还有部分人员如黎浚、史荣保、王澎、李守楨等,于1940年初,同四区抗日农村剧团合并,改组为《襄垣县群众剧团》。主要领导人:团长史荣保,先后担任政治指导员有黎浚、王澎,艺术指导员兼编辑主任李森秀(王村人),副团长曹双喜。改组之后,对旧

艺人进行了改造。首先提出戒除大烟,从算帐中打通思想,发动大家制定戒烟计划,提倡互相监督,人人检查。紧接着,剧团开始进行内部整顿,废除了“掌班”(剧团成立后改名“业务团长”)操纵全团经济大权及干部额外津贴等制度。执行了经济公开、发扬民主的新制度。演员们第一次民主选举了管理自己生活的经济委员会。团内民主生活的开展又促使了传统师徒关系的动摇,“收下徒弟买下马,由我骂来由我打”的思想一下子失去了威力。新老艺人经过一段波折后,统一了思想,剧团出现师徒之间互尊互爱,互帮互学的新风气。

1941年冬,史荣保、王澎二同志先后调离剧团。中共襄垣县委,为加强剧团领导,于1942年春,调县委宣传部阎德贞(韩庄人)同志兼任剧团政治指导员,调王村村长李琪鸣同志任剧团团长。为充实力量,1942年以后,又吸收了一批名老艺人进团。当时,剧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亲身经历过地主阶级的压迫。所以,他们最能逼真地表现农民斗争生活。在每年春耕、夏收、秋收的农忙季节,剧团放假时,都要向演职员布置下搜集素材的任务。

1943年,《襄垣县群众剧团》改名为《襄垣县农村剧团》。该团的活动范围,不仅足迹遍布太行,而且跑遍了晋冀鲁豫边区,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爱戴和欢迎。

1946年春,晋冀鲁豫军区,为活跃前线文化生活和加强军队政治宣传工作,抽襄垣县农村剧团的大部分演职员上调军区,组建了《晋冀鲁豫军区后勤政治部人民剧团》(简称“军区人民剧团”)。从此,襄垣秧歌剧团分为两个表演团体。军区人民剧团团长李琪鸣,指导员梅林(军人),副指导员张人道(庄里人),艺委会主任李守祯,副主任韩德山,生活大队长张金替,生产部主任李生林。襄垣县农村剧团,团长陈汉平(又名“陈旦孩”),指导员史效忠(又名:“史旦孩”)。在这一时期,襄垣县农村剧团和军区人民剧团,相互学习,相互援助,同心协力,并肩作战。军区人民剧团主要在前线和新解放区演出。农村剧团主要活动在老解放区。

1947年夏,部队南下后,军区人民剧团改由太行行署领导,并改名《太行人民剧团》。团长李琪鸣,指导员李守祯,副指导员李生林,副团长张金替。这一时期,剧团除在边区各地演出外,还在中央和边区、行署召开的重要会议上演出多次。如中共中央·冶陶会议,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戏剧工作者座谈会,每次演出后都得到中央和边区首长的好评和奖励。不少文艺界知名人士在报端发表文章,给剧团以很高的声誉。1947年5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泽然《农村剧团的旗帜——记太行人民剧团的成长》的文章,高度赞扬和评价了襄垣农村剧团。中央局薄一波同

志,特意送给一面奖旗,称赞剧团是“农村剧团的旗帜”。中央局宣传部除奖给五万元奖金外,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交流了农村剧团和太行人民剧团演出的经验。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陈荒煤《农村剧团的提高》的文章。194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太行三专署关于农村剧团的指示》,指示各县剧团要向襄垣农村剧团学习。

1948年8月,《太行人民剧团》和《太行光明剧团》(原武乡光明剧团)合并,改组为《太行文艺工作团》。1949年改名为《山西省文工二团》。以后,又改为《乡村文艺工作队》。

1949年,原上调军区的演职员先后复员,陆续返县。襄垣县农村剧团经过整顿,改名《大众剧团》。团长陈汉平,指导员李琪鸣,副团长张金替、连海法,副指导员史效忠。这时,剧团力量雄厚,阵容强大,行当齐全,名角叠出。全团人员多达七十余名。1952年“三反”运动中,团长陈汉平自杀后,连海法继任团长。1955年,中共襄垣县委派李悦胜到剧团任党支部书记,李琪鸣改任团长,李生林任副支书,史效忠、连海法、李小焕任副团长。1956年转为地方国营,改名为《襄垣县人民剧团》。1962年,仍下放为自负盈亏,改名《襄垣县秧歌剧团》。从1958年到1982年,先后担任剧团主要领导的有:孙维仁、梁鸿飞、宋显荣、孙加飞、范步华、李天保、赵巾又、李喜旺、杨里胜等。1983

年,按上级指示精神,剧团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承包人马庆芳,支书仍由赵巾又担任。后来,承包人改为郭海旺,支书由李金水担任。1986年,襄垣落子剧团和秧歌剧团合并后,团长由韩国俊担任,支书先由孙中德担任,后由杨升祥代理支部书记职务。1987年,县委调李文林同志担任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团长。1997年,剧团经过选举后,常翠平担任团长,崔怀朋担任支部书记。1999年5月,县委将剧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团长由韩宏喜担任,支部书记由杨升祥担任。

在襄垣戏剧史上,还以上党落子的演唱形式组建了剧团。1950年,政府文教科成立了《潞河剧团》,团长张金库,副团长张奎孩。因剧团共产党员太少,不能成立党支部,故且无有支部书记。当时,张奎孩为了使剧团早日出台,毅然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变卖,所卖资金,都投资了潞河剧团。1952年,《潞河剧团》归县政府领导,改名为《曙光剧团》。党支部书记王国法,团长张金库,副团长张奎孩。1960年,《曙光剧团》改名为《襄垣人民二团》,梁鸿飞任党支部书记,张金库任团长,刘华章任副团长兼团支部书记。1980年,成立了襄垣县落子剧团,杨里胜任党支部书记,范步华任团长,李金水任副支书。1983年,按上级指示精神,《落子剧团》也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承包人彭存喜,支部书记由张生华担任。1986年,《落子剧团》与《秧歌剧团》合并。